七日談（澳門篇）

文明互鑒 交友之道

穆欣欣

兩千多年前，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今天我們說，與優秀的人為伍，也應善於發現身邊人的長處。

成熟的人都懂，與友相處，不必要求朋友變成和自己一樣，重要的是我們善於發現對方的優點、學習對方的長處。而這些，是建立在善意、理解、尊重、信任的基礎上。互愛互助，互學互鑒，共同進步，方為久處不厭、讓友情保鮮之道。

文明互鑒，實為交友之道。它就是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彼此理解、學習與借鑒，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連續兩年，澳門特區政府主辦「文明互鑒國際論壇」，廣邀海內外學者齊聚澳門，共商文明互鑒發展。作為文明互鑒論壇的舉辦地，澳門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生動樣本。隨着「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深入實施和成功實踐，我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也逐步加深。

「一國兩制」除了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解釋外，也蘊含着文明互鑒的深刻內涵——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族群在澳門這片土地上長久地和平相處，是「一國兩制」文化敘事的重要內容。澳門以中華文化為主體，長期以來，民間蘊含着維護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自覺。在葡萄牙相對鬆散的管治和上述民間維護之間，形成平衡的張力。這裏說的葡萄牙相對鬆散的管理，是相對英治下的香港精英文化培養而言，葡萄牙並未從教育、葡萄牙語的學習上對澳門華人進行強制灌輸。中華文化在澳門民間有了生長的土壤，其中非精英階層的「小傳統」，在澳門文化中佔有重要位置。同時在面對異質文化時，中華文化表現出強大的包容和彈性，尊重並給予外來文化生存空間，顯露出其特有的本質——不忘本來，吸收外來。

澳門的歷史，是不同文化長期相遇、交流，並在相處中產生信任繼而互相學習的過程。從澳門經驗看，文明互鑒亦需要有生長土壤：首先是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與持續發展；其次是長期保持對外交往。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遠航，為澳門帶來人的流動和遷徙，開啟了全球化的力量。海洋推動了商業貿易，也推動了人文交流，這些範圍廣泛的遠航，為文化藝術、語言與食物等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為澳門的中西文化交匯留下歷史印記。對於全球化的理解，不應片面地限於經濟與產業的聯繫，它需要人文基礎為支撐，全球化應給予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站在全球化視角回望澳門的歷史，集世界經驗，從澳門出發，為今後的文明互鑒探尋方向。澳門長期積累的經驗，也與全球治理倡議所重視的合作和共同發展相契合。澳門的經驗足以向世界說明：尊重差異，不妨礙共同發展；保持特色，也可以共同創造。

青年是未來。促進文明互鑒，在於青年一代如何處理差異。從尊重差異中學會理解，學會和自己價值觀不一致的人溝通對話，解決問題，這關乎世界的未來，也是文明互鑒的根本。

三觀一致，往往會成為我們共通的交友標準。看待人、事、世界的態度相近，大家更容易彼此欣賞，因為我們從和自己相類似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說到底，我們欣賞的還是自己。考驗一個人是否真有修養，其實是看他如何面對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我見過平日溫文爾雅的人，聽到不和諧之音，立即暴跳如雷，視發聲者為異類，不惜以一切手段驅逐異類。

因此，教育是起點。知識儲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讓青年人具有理解和處理差異的能力。當下的青年人所面對的，不再是一城一地的人和事，他們面對的是彼此相連的整個世界。

網絡是全球化進程中不可忽略的力量。這份互聯互通讓我們看到，不同地方的年輕人對相同的事物感興趣，對未來也有着相似的焦慮。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來自台灣的楊渡先生。連續兩年的論壇上，我和楊先生都參加了同一組討論。這一次，他談到海峽兩岸青年使用詞語逐漸趨同的現象。

以馬鈴薯為例，內地常稱「土豆」，港澳稱「薯仔」，內地有些地方稱「洋芋」或「山藥蛋」，「山藥蛋」一詞還被用來命名文學流派「山藥蛋派」。而在台灣閩南語中，「土豆」指的卻是花生。可見同一個詞語，在不同地方指涉不同事物，反映了語言使用的差異。

楊先生回憶，他曾參與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大辭典》的工作。這項工作自二〇一〇年開始，歷時六年；編纂期間所觀察到的兩岸常用詞差異比例，由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七，互聯網促進了兩地年輕人在詞語使用上的趨同。他說：「他們（年輕人）穿透了網絡世界、穿透了消費文明。台灣年輕人也在玩抖音、用小紅書。所謂政治的藩籬，是阻擋不了這些的。」

當下，人工智能和翻譯軟件確實有助於減少語言造成的溝通障礙，但語言背後還有文化和知識，並非翻譯了字詞就能完全理解。比如中國人見面習慣問對方「吃了嗎？」要讓外國朋友理解其中的文化含義，以及對應各自的生活場景該如何翻譯，仍然存在難度。語言學習的目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的文化，而不僅僅是字詞表層的意思。

媒體以「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朋友」向出席論壇的學者發問。

他們的回答，道出了文明互鑒的重要基礎：

「尊重不同的身份認同，對交友很重要。」

「對話和交流變得日益重要。」

「保持開放的心態，去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聊一聊，學一些新知識。」



◀表演隊伍在二〇二六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上。 資料圖片

當年輕人愛上博物館

黛西札記

李夢照

不久前，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看「清宮四時」新展。周末午後，館內人頭湧湧，環顧四圍，大都是年輕人：有人湊近展櫃，細看《胤禛耕織圖》冊頁題詩；有人在「御筆迎春」互動書法站臨摹「福」字；還有人興致勃勃買到「天子貓咪」文創公仔，在文創禮品店外打卡拍照。

二十年前的我們，或許很難想像如今的博物館會是這般熱鬧。香港故宮館訪客的平均年齡為三十三歲，其中四十五歲以下的觀眾佔七成以上。M+博物館去年吸引二百六十萬人入場，超過八成觀眾為四十五歲以下。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館和韓國首爾的歷史博物館。除了逛公園，如今的年輕人越來越愛上逛博物館。為什麼？

首先在策展的創意。曾經的博物館通常按照編年和品類陳列作品，多為靜態展示，氛圍莊重，少些活潑；如今，博物館早已變為說故事的空間，不僅有文物，更有文物背後綿長、鮮活的故事。當我們見到清代宮廷瓷器、漆器和書畫等，或難以產生真切體會，而當策展團隊將件件作品用故事串聯起來，講一個「春眠不覺曉」或「行行重行行」的故事，尤能讓觀者感同身受，過目難忘。

另一個關鍵在於文創。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吸引大小朋友體驗考古學者的工作，親手「挖」出一枚青銅虎符；上海博物館的美洲展文創，提煉千百年前拉美民族圖騰元素，做成寓意吉祥的手鏈；還有甘肅省博物館那隻「賣萌」的馬踏飛燕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創下銷售奇跡的鳳冠冰箱貼……如今的博物館文創可謂豐富多元、各美其美，不再是文物的簡單複製或在器物上加一個logo，而是將我們在館內的所見所感變成一次次可感可觸的經驗。

不少人擔心「打卡」會消解博物館的深度，我卻覺得打卡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我們總是免不了先被美的事物吸引，然後才停下來，細看並思考。在什麼都可以滑動、跳躍或加速的時代，博物館和館內的藏品願意陪你慢下來、靜下來，感受從未經歷卻又似曾相識的時空、經驗和情緒。在這一重詩意空間，我們總能被這樣那樣的事物吸引，或是書法家寫給朋友的一行詩，或是江中一葉小舟，又或是一隻像你我一樣、遊蕩在紅牆樹影下的貓。年輕人愛上博物館，愛上的不僅是歷史中的文物，還有那些生活裏難得的詩意片段，那些可意會難言傳的、親切的嚮往。

我心蕩漾

英倫漫話

江恆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時候可以隨心所欲，在英國就有一群人，他們生活於水波光影，雖經歷酸甜苦辣，卻總能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在英國享有聲譽的女作家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於一九七九年發表了小說《離岸》，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倫敦運河上一群船居者的故事，讓這個獨特群體進入公眾視野。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有獨自帶着兩個女兒生活的單親母親；與妻子意見分歧的退役海軍軍官；想將船隻出售賺取養老金的年邁航海藝術家；生活頹廢但不失溫柔與善良的年輕小伙，以及熱衷於船隻維修的退休董事等等，而一條約二米寬的斑駁窄船（Narrow boat）就是全部家當。他們每日的生活過得無拘無束，「你可以在裏面盡情地歡唱，痛快地豪飲」，儘管有時會發生些意外，「郵差兩次從沒有固定好的跳板掉進河裏，一上午的信件全泡成了大河裏的一堆垃圾，英國郵政總署理由充分地通知他們不再派送了」，甚至「早晚有一天，你的船也會變成一片片碎片，陷入泥土，片片流向大海」，可是大家仍能苦中作樂。

小說寫得如此生動，與佩內洛普的親身經歷有關。上世紀六十年代處於低谷期、收入微薄的她，也曾住在泰晤士河的船屋上。直到有一天，她在自己執教的課堂上遲到了，原因竟是：「對不起，我的房子沉了」。用這位大器晚成、年近七旬憑藉《離岸》擊敗奈保爾《大河灣》獲得布克文學獎的作家的話說，「既然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那就得接受它的一切。生活嘛，無非是壞了就修。修不好的時候，急也沒用，那就等等吧。」往更遠處看，「你學過的每一樣東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難，都會在你一生中的某個時候派上用場。」

實際上，與一般意義上的水上人家不同，他們居住的運河起源於工業革命時期人工開鑿的狹窄水道，河面之所以不寬，通常僅能通過兩至三條窄船，是因為從成本考慮，只需滿足方便運輸煤炭、礦產等物資即可。當時為取代傳統的畜力，在「運河熱」的驅動下，各地興建的運河四通八達，幾乎與所有水系相連，形成「黃金水路」的大聯合運河，號稱工業革命的「生命線」。隨着十九世紀中期鐵路的興起，運河的地位盛極而衰，已不再是繁忙的貨物運輸幹道，逐漸變得淤積廢棄。

英國作家湯姆·羅爾特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小說《窄船》，便記述了他與妻子如何改造和裝修一艘窄船，並以此為家周遊英國運河的所見所聞，也因此重新喚起人們對這些舊水道的興趣。作者在大約四百英里的旅程中，描繪出運河旅行的獨特：「從繁華大道一步下到安靜的運河道，即使在城中心，是一步跨回至少一百年前，給人一種不同，或許比較平衡的觀點來看事物。」但他同時也不忍心運河的滿目瘡痍，尤其是沿途水閘、水道橋的破敗，進而激起運河迷們在七十年代的挽救運動，許多運河得以起死回生，變成後來旅遊觀光和休憩活動的路線。比如倫敦市中心的攝政運河有一段觀光水域，碧波蕩漾，柳樹成蔭，被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稱為「小威尼斯」，以形容它的優雅與寧靜。

從二〇一四年初次上映便大受歡迎的英國紀錄片《偉大運河之旅》系列，更讓觀眾隨着一對老夫妻主持人的視角，順着修復的水道一路暢遊，探索英國運河的前世今生。比如在英格蘭東北部的老工業城市約克郡，想像着十九世紀時到處是織造廠，高峰時期佔全世界大半的布料供給，後來沒落留下了大片廢棄的廠房，但如今運河綠蔭環繞，岸上的人們散步、慢跑或騎單車，享受着現代與古樸交融的詩意。



▲英國倫敦攝政運河「小威尼斯」一景。 資料圖片

如果說《離岸》中的運河人是為逃避生活，那麼近年船屋因極簡、易居、浪漫等特質而漸成時尚，「就像住在時間機器裏一樣：前一秒打開大門還是托特漢姆，轉眼外面已是肯頓市集，每次走出房間都會來到一個新的地方。」青年作家亞當·威莫特在專欄中自述，船屋空間固然狹小，活動空間非常有限，但「清晨拂曉有人經過時，躺在床上感到船體微微顛簸，遇上雨天，雨點密密地打在船頂上，隔着窗戶傾聽雨打玻璃的聲音」，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當然船也不僅僅用於來住，受小說《老人河的孩子》的影響，英國最具創意的漂浮書店「水上的字」（Word on the Water）應運而生。前者小說的主人公是在浮板上建成一座船上劇院，而後者的書店主人斯克里奇則在十五米長的艙壁上塞滿了書籍，成為大英圖書館旁邊攝政運河上的一道景觀，很多人慕名而來。用他本人的話講，「書籍被認為是即將過時的東西，運河也是。但這些是人們永遠都會喜歡的事物。為此運河得以保留，書籍和書店也會倖存下來。」

對於生活在運河上的人來說，那些搖擺的船屋，雖漂泊不定，卻有如一壺老酒，令人心神蕩漾，就像《離岸》中說的那樣，「我們現在這麼活着就挺好，在陸地和河流之間。」

偉人載歌返香江

——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香港演出回顧（下）

HK人與事

丘樹宏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六日當晚，「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暨國慶音樂會」正式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拉開帷幕，近千個座位座無虛席。當《孫中山》的旋律在音樂廳裏第一次響起時，整個現場鴉雀無聲，觀眾的目光都緊緊追隨着舞台上的演奏和演唱。我坐在觀眾席裏，看着身邊不同年齡層的聽眾，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穿着校服的中學生，有在香港工作的年輕白領，他們臉上的專注神情讓我知道，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沒有白費。

演出結束後，《大公報》專門刊文，稱這個版本的組歌是「全新版本，耳目一新」，優美的旋律、通俗的唱腔搭配豐富的樂器編排，用絢麗的音樂手法把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故事娓娓道來。很多香港觀眾在散場後特意留下來和我們交流，說之前只在歷史課本裏知道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卻從來沒有像這一刻這樣，通過音樂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的理想、他的掙扎、他為中華民族復興付出的一生心血。蔡冠深先生後來跟我說，看到年輕人看完演出之後主動找工作人員要組歌的歌詞資料，那一刻他就知道，這場演出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這場首演之後，《孫中山》的傳播路徑變得更加寬廣。當年十一月，作品再次走進馬來西亞吉隆坡演出，十二月的台灣公演也被國務院台辦列為二〇一六年對台交流重點項目。而在香港，這場演出也正式拉開了當地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系列活動的序幕，後續的一系列展覽、分享會，因為這場音樂會的鋪墊，獲得了更多香港市民的關注和參與。

時至今日，距離那場演出已經過去整整十年，我依然時常會想起維港之畔那個旋律流淌的夜晚。我和蔡冠深先生後來又在不同的文化活動裏多次碰面，我們聊起當年的這場合作，都有同一個感慨：文化的力量，從來都比我們想像中更深遠。

那天演出結束後，我們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門口告別，海風把我們的衣角吹起，維多利亞港燈火璀璨。蔡冠深先生指着維港對面孫中山紀念館的方向跟我說：「以後我們還要做更多這樣的事，讓香港的年輕人一代一代，都記得中山先生的故事，記得我們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這句話我一直記到今天。香江的弦歌從來不會停歇，那些刻在我們民族骨血裏的精神與情懷，總會借着旋律、借着文字、借着代代相傳的行動，跨越時間，一次又一次在人們心中響起。

遠遠地窺探了一下／「莫蘭蒂」識趣而退／維多利亞港風平浪靜／獅子山聳立崢嶸巍巍／／風去了雲開了天空浩浩／鳥飛翔魚跳躍海風輕吹／伴隨繞樑三日的天籟之音／一輪久違的太陽款款而歸／／風吹過雨打過歲月經歷蹉跎／從未忘記這裏的山這裏的水／一百年的滄海已嬗變成桑田／金紫荊映照出紅日一片明媚／／這是一個怎樣美輪美奐的中秋啊／從早到晚夢想總與你我如影相隨／團圓的歌聲溢滿銀色的夜空／中秋的香港／今天日月同輝！